

清园近思录

王元化



清园近思录

王元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园近思录/王元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

ISBN 7-5004-2192-3

I. 清…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77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4

字数:211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1.20 元



王元化近影



上海图书馆 204 研究室，王元化写作回忆录的地方

目 次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1)
关于斯城之会及其他答问	(35)
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53)
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	(72)
关于现代思想史答问	(77)
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	(85)
 自述	 (133)
附录：一切诚念终当相遇	(141)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150)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167)
《莎剧解读》跋	(202)
记辛劳	(209)

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式上致词	(220)
纪念与超越	(222)
说辩	(225)
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问世的时候	(228)
悼冯契	(232)
悼目加田诚	(235)
在南京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237)
在京剧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240)
邓红梅博士论文评语	(243)
观汪芜生摄影展小记	(245)
答友人书	(247)
《文心雕龙学综览》序	(251)
《思辨随笔》序	(255)
《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	(261)
《学术集林》卷二编后记	(263)
《学术集林》卷三编后记	(267)
《学术集林》卷四编后记	(272)
《学术集林》卷五编后记	(277)
《学术集林》卷六编后记	(285)

《学术集林》卷七编后记	(289)
《学术集林》卷八编后记	(294)
《学术集林》卷九编后记	(303)
《学术集林》卷十编后记	(309)
《太虚法师年谱》	(315)
《衡报》	(319)
《文化与人生》	(324)
《革命史谭》	(328)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333)
《胡适的日记》	(338)
《早点前》	(342)
《读黑格尔·美学》评注选录	(347)
释真实	(347)
说知性	(348)
细节和主体	(349)
差异面的统一	(350)
思想与敏感接受	(351)
自然美缺陷说批判	(352)

析艺术清洗	(357)
艺术创作的不同等级	(358)
灵感	(362)
自然的范本	(363)
动作和情节	(365)
冲突	(366)
环境与性格	(367)
有辩护理由	(369)
法国古典主义	(370)
创作活动	(372)
形象的构成过程	(373)
灵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	(375)
黑格尔反对故弄玄虚	(376)
作风·风格·独创性	(377)
癸酉日记	(380)
后记	(432)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一

杜亚泉，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伦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伦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一八九八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案亚泉二字为氩、线之省笔。氩是一种惰性化学元素，线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用这两个字原表示自谦之意。可是他没有料到，氩在今天已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了。）一九

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张元济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王云五《小学自然科词书序》称：经他负责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笔者少时读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就是他编译的。）至今仍在延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也是出于他的手定。由于这些成就，人们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徐寿以后至二十世纪初成绩卓著的学者。他在主编任上，奖掖后进，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胡愈之回忆在《东方杂志》当编辑时说，曾得到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见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至一九二零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十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达二百篇。其中有些文章，今天读来，仍有一定启迪作用。《东方杂志》编辑部在他去世后，在悼文中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

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蔡元培也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他在胡适以前，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今天看来，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少弊端，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问题时，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要通情达理得多。

“五四”时期，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这场论战肇始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批判《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不久，杜亚泉于一九二零年迫于情势（受论战影响）辞去主编职务，同时也不再为杂志撰稿，仅担任编辑课本工作，同时创办新中华学院。两年后因经费告绌而停办，负债数千元。淞沪战争爆发，商务毁于日军炮火。杜亚泉举家避难回乡。次年，患肋膜炎，十二月六日逝世，享年六十岁。他在病时，无钱医治，下葬时借棺入殓，身后萧条，令人倍觉凄凉。张梓生于《新社会》半月刊撰文悼念，言词甚哀，极为沉痛：“国人对于人物之崇仰，久失其正鹄。当曲园之死，举国淡然，时王静安已有所感。近则时局变幻，人心愈趋卑下，对数政客官僚之死亡，报纸争载，市巷纷谈；而对于品格崇高，行足讽世之

学人之逝世，除三数熟友外，类皆无所感怀。”（案王静安语见《教育小言十则》第五节：“德清俞氏之歿几半年矣。俞氏之于学问，固非有所心得，然其为学之敏，与著书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学者之好模范也。然于其死也，社会上无铺张之者，亦无致哀悼之词者，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用于此观之矣。”）

二

杜亚泉逝世后，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有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渐渐湮没无闻了。解放后所出版的《现代思想史论》，对“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未置一词。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根据现在涉及杜亚泉的几篇文章来看，却是毁多誉少，有的甚至把他诋为落伍者。现在是应该对他作心平气和的再认识、再估价的时候了。

杜亚泉在任主编前就已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初两篇文章是《物质进化论》和《伦理标准论》，

接着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就这些文章看，他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九一二年他在《减政主义》一文中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他认为政府对于社会，只能养其活力的源泉，而不要使之涸竭；只能顺其发展的进路，而不要设置障碍。只有这样，社会的活力才得以顺畅发展。所以政府在教育事业和工商事业方面，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教育家，自己去经营工商事业。要使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章中（《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个人与国家之界说》等）亦多有阐发。

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

展。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契约论。近年来，海外学术界重新探讨了黑格尔等市民社会理论，大多认为如果无条件地承认国家至上独尊的地位，就会导致国家对人民权力的剥夺或侵吞。杜亚泉在《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中，也批判了国家主义“强他人没入国家”与“强个人没入国家”的现象，说这是“侵犯他人的自由，蔑视基本人权”。他在《论思想战》中，把这种自由思想阐发得更为透彻。这篇文章提出四项原则，前面两条说的是开濬与广博思想，属于思想修养的问题。后两条，一条是“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另一条是“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观点，固然来自传统资源，但杜亚泉使它和现代民主思想接轨。数十年后，胡适声称他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那场论战中和杜亚泉站在对垒地位的陈独秀，到了晚年也说，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但他在那场论争中，曾经是多么疾言厉色地批判了杜亚泉。杜亚泉写的《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中提到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他在“五四”前后就提出这些看法，说

明他的思想敏锐，这使他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的地位。

三

我认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百余年来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后，以曾、张、李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希望从西方引进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可是甲午一战，惨遭失败。继起者认识到不经过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的，于是出现了康梁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了帝制，但政治情况却并未改善。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在共和制下，竟出现了议会贿选、政客收买猪仔议员的丑剧。继起者再一次认识到共和政治制度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上形成，于是“五四”的思想革命诞生了。这些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

守了。

对于改革，杜亚泉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个人之改革》一文中，阐明了他的改革观念：“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迷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故近二三十年以内，社会变动之状况，虽左旋右转，方向不同，而其以改革为动机则一也。社会间稍有智能之人士，其对社会之运动，虽温和急进，手段不同，而其以改革为目的则一也。改革云者，实吾侪社会新陈代谢之机能，而亦吾侪社会生死存亡之关键也。”他清楚说明改革是他坚定的信念，这里没有什么虚饰或权辩，他对改革是真诚的。可是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度。四年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爆发，他的东西文化调和论，被陈独秀斥之为“人类惰性的恶德”。陈独秀持急进彻底态度的原因，可用他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的几句话来说明：“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新青年》同仁中有些人包括鲁迅也说过类似讨价还价的